

杜文玉◎主编

唐史论丛

第十一辑

三秦出版社

卷之四
文
哲
集

一

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古都长安与隋唐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专集

三秦出版社

唐史论丛

第十一辑

杜文玉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
中国唐史学会 主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史论丛. 第11辑 / 杜文玉主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736 - 488 - 7

I. 唐… II. 杜… III. 唐代—历史—研究—丛刊 IV.
K242.07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7088 号

唐史论丛(第十一辑)

杜文玉 主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50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736 - 488 - 7
定 价 50.00 元

目 录

关于唐代中期南方“客军”诸问题的考察	朱德军/1
南使(市)城考	雍际春/15
唐“铜匭”设置地点小考	毛 蕾/23
论唐宋之际登闻鼓职能的强化及影响	赵 旭/30
唐代府州司马考论	王 颜 任斌杰/46
唐代墓志中“六条”源流辨析	严耀中/58
下情上达:两种“状”的应用与唐朝的信息传递	吴丽娱/65
论唐代尚书令废置的真实历程	
——史籍相关记载的再考察	王西坤/71
唐宗正寺长官考	刘思怡/78
析论唐代中央官学教育的特性	(台)任育才/91
唐代中晚期中央官学没落原因之探讨	(台)黄俊文/110
唐五代时期的城市管理制度	张春兰/120
唐代长安的朝贺之礼	(日)金子修一/129
论唐代大酺中的社会动员意义	陈 雯/139
试论唐代北人江南生态意象的转变	
——以白居易江南诗歌为中心	夏 炎/147
浅探西域文化在唐人园林、庭院中的流痕	刘永连/167
联珠纹饰与中西文化交流	
——以西安出土文物为例	韩 香/188
从道宣的戒坛设计到法藏的华严寺造像	
——以碑林藏神龙二年(706)造像座为中心	季爱民/199
镇江甘露寺唐代舍利瘞埋制度及舍利子研究	毛 颖/212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建筑研究	陈大为/221
公元7—9世纪库布齐沙漠分布范围探考	艾 冲/251
九世纪初张保皋海洋活动关联问题研究的现状	
——以唐与新罗关系为中心	拜根兴/261
南汉时期广州城市布局及建筑研究	周加胜/271
晚唐五代李茂贞假子考论	王凤翔/281

《天圣令》所附唐令中有关社会生活的新资料(上)	黄正建/288
开元八年洛阳水灾试析	朱宇强/298
唐代歙州经济发展略论	陈 勇/308
五代时期畜牧业发展状况初探	杜文玉/322
敦煌壁画中的妇女饰黄妆	
——妆饰文化研究之七	卢秀文/334
小说的正史化	
——以《新唐书·吴保安传》为例	(台)赖瑞和/343
唐五代音声人辨析	欧 燕/356
唐代在室女丧葬问题探讨	万军杰/364
唐张浚墓志简疏	赵振华/375
唐萧龄之墓志考释	毛阳光/383
隋唐时期的荥阳郑羲房	邢学敏/389

Contents

Investigation on Various Problems of South “Visiting Forces” in the Medium-term of the Tang Dynasty	Zhu Dejun/1
Study on the Nanshi City	Yong Jichun/15
Study on the Location of “Tonggui” in Daming Palace	Mao Lei/23
The Fortification of Dengwen Drum and its Influence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ang & Song Dynasties	Zhao Xu/30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Mansion Si Ma in the Tang Dynasty
.....	Wang Yan Ren Binjie/46
On Discrimination about “Six” Stream in the Epitaph of the Tang Dynasty
.....	Yan Yaozhong/58
Message Delivering Upwards: Application of Two Types of Document “Zhuang”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n the Tang Dynasty	Wu Liyu/65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Abolishment of Shangshu Ling in the Tang Dynasty: Reanalysis about Relate Recordation in Historical Records	Wang Xikun/71
Textual Research of Senior Official of the zongzhengsi in the Tang Dynasty
.....	Liu Siyi/78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entral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	(Tai) Ren Yucai/91
Research on the Waning Causes of the Central School in the Mid and Late Tang Dynasty
.....	(Tai) Huang Junwen/110
C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Zhang Chunlan/120
On the Chao He Ceremony in Chang’an in the Tang Dynasty
.....	(Jap.) Jin Zi Xiu Yi/129
On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Significance of Dapu in the Tang Dynasty	Chen Wen/139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Transition of the Ecological Imagery in South of Yangzi River of the Northern Chinese in the Tang Dynasty ;Jiangnan Poem by Bai Juyi
.....	Xia Yan/147
On the Trac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Culture in Chinese Garden and the Courtyard in the Tang Dynasty	Liu Yonglian/167

On Lianzhu Decoration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Unearthed Relics in Xi'an	Han Xiang/188
From Daoxuan's Designation of the Ordination Platform to Fazang's Sculpture for the Huayan Monastery: Centers on the Entablement of Shenlong 2(706) Collected by the Beilin Museum	Ji Aimin/199
Study on the Buddhist relics and its Bury System at Sweet Dew Temple in Zhenjiang in the Tang Dynasty	Mao Ying/212
Research on the Dunhuang Monastic Architecture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Five Dynasty and in the Song Dynasty	Chen Dawei/221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Range of the Kubuqi Desert in the Seventh and Ninth Centuries A. D.	Ai Chong/251
The Present Conditions on Researches of Problems for Zhang Bao-gao's Overseas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9th Century—An Exempl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Silla	Bai Genxing/261
On the Guangzhou City Layout and Architecture in the South Han Dynasty	Zhou Jiasheng/271
Study on the Adopted Son by Li Maozhen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Wang Fengxiang/281
New Data on Daily Life Found in the Tang Statutes Attached to the Tiansheng Statutes(the first part)	Huang Zhengjian/288
Luoyang Floods in 720 A. D.	Zhu Yuqiang/298
A Brief Commen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he 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Chen Yong/308
On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Conditions in the Five Dynasty	Du Wenyu/322
Study on the Women Adorned with Yellow Makeup in the Dunhuang Frescoes; the Seventh Adornment Cultural Study	Lu Xiuwen/334
The Historization of Tang Fiction: The Story of Wu Baoan	(Tai)S. F. Lai/343
Analysis on the People of Yinsheng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Ou Yan/356
Research on the Funerals of Unmarried Girls in the Tang Dynasty	Wan Junjie/364
On Zhang Shui Epitaph in the Tang Dynasty	Zhao Zhenhua/375
Textual Research on Xiao Lingzhi Epitaph in the Tang Dynasty	Mao Yangguang/383
On Zheng Xi Family at Xing yang in Sui-Tang Dynasty	Xing Xuemin/389

关于唐代中期南方“客军”诸问题的考察

朱德军

“客军”^①作为一个颇具特色的历史现象,是涉及唐中后期史籍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汇。它对当时国家整体的军事安全以及地方政局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南方地区来说就更是如此。由于史籍记述的芜杂以及史料的残缺,加上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则付诸阙如,因此,对此颇有进行一番探讨之必要。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天下纷扰,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北方,由于战争的旷日持久,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整个地区呈现出萧条与破败的景象。其后,随着“戎事方殷”^②,那些曾经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社会经济仍得不到有效的恢复与发展,而富庶的南方由于没有受到严重的兵燹之灾,使得这一地区逐渐成长为国家最重要的赋税来源。

唐中央为了维持帝国的存续,并确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为满足庞大的“军国之需”,对南方地区进行长期竭泽而渔的经济掠夺,造成人民不堪重负,加上地方“豪农”“奸贾”“诸军”“诸使”“权豪之家”的竞相逃避徭役、转嫁社会负担^③,造成大量贫困的民众纷纷加入流民的行列,而政府面对这一问题却实行在籍均摊的政策,于是造成更大规模的逃亡。沉重的赋税重负终于将生活无着的人们逼上了绝路,为了谋取生存,他们纷纷“相聚山泽为盗”^④;而南方地区“倔强之臣”^⑤的“窃地弄兵”^⑥也同样会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但是,唐中期以来,朝廷为确保南方作为国家赋税“首善之区”的地位,有意识地实行“土军”的“团练化”、统领官员的“文职化”以及军力“薄弱化”的政策^⑦。不可否认,这一政策虽带来“天下方镇,东南最宁”^⑧的积极意义,却也造成南方“土军”稳定地方秩序能力的缺乏。地方在对付诸如“上至百五十人,下不减三二十人”的“江贼”已显得颇为困难^⑨,应对“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⑩的农民起义更是束手无策,要是发生了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参与的大规模社会动乱,若非征调外部“客军”的驰援,地方政局的稳定根本无法维持。

一、关于出兵南方地区“客军”来源的考察

唐中央戡定安史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南方地区一度出现为数不少的农民起义以及一些势力谋取割据的企图,地方局势呈现出激烈的动荡之势。由于该地区

军队自身人员的组成(军队“团练化”)、统帅的素质(统帅的“文职化”)以及军队训练的不足,造成“土军”平叛乏力(军力“薄弱化”)。因此,每次该地区发生较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我们总不难发现外部军队——“客军”介入的身影。至于介入南方地区“客军”属于何种类型的军队,它们来自何方,这些无疑是需要研究中加以解决的问题。为了探讨问题的方便,笔者撷取唐代中期十次有代表性的社会动乱为考察对象,本文具体上是指五次叛乱(即永王璘之乱、刘展之乱、刘辟之乱、李錡之乱、吴元济之乱)与五次民变(即袁晁起义、裘甫起义、庞勋起义、王郢起义、王仙芝黄巢起义),下面分别从“客军”出兵南方的时间、出兵的目的、军队的来源、客军的统领者等方面列表说明:

客军出兵的时间	客军出兵的目的	客军的来源	客军的统领者	资料出处
至德元载十二月——至德二载二月	平定永王璘之乱	江南西道④ 淮南④ 河北③ 江西④	吴郡太守李希言 丹徒郡太守阎敬之 河北招讨判官李铣 江西采访使皇甫侁 广陵郡长史李成式	《新唐书》卷八二《皇室诸子·永王璘传》 《旧唐书》卷一〇七《玄宗诸子·永王璘传》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至德元载十二月
上元元年十一月——上元二年正月	平定刘展之乱	淮南④ 浙东④ 平卢③	江淮都统浙东节帅李岷 楚州刺史李藏用 淮南节度使邓景山 平卢兵马使田神功	《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岷传》 《新唐书》卷八〇《田神功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二二二上元元年十一月——二年正月
宝应元年八月——广德元年四月	镇压浙东袁晁起义	李光弼部③	光弼判官御史中丞袁修 李光弼部将张伯仪 李光弼部将柏良器 山南东道节度使嗣曹王李皋	《新唐书》卷一七〇《王栖曜传》 《唐国史补》卷上 《旧唐书》卷一五二《王栖曜传》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广德元年四月 《全唐文补遗》(第一辑)《山南东道节度使嗣曹王墓志铭》
永贞元年八月——元和元年九月	平定西川刘辟之乱	山南西道④、剑南东川④、神策军 岭南④	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 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 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 左右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 岭南节度使徐申	《韩愈集》卷三〇《碑志七》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 《旧唐书》卷一四〇《韦皋附刘辟传》 《全唐文》卷五六《授高崇文剑南西川节度使制》

客军出兵的时间	客军出兵的目的	客军的来源	客军的统领者	资料出处
元和二年九月——十月	平定浙西李錡之乱	宣武③、武宁(感化)③、武昌(鄂岳)④、宣歙④、淮南④、江西④、浙东④	淮南节度使王锬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二年九月——十月
元和九年十月——元和十二年十月	平淮西吴元济之乱	忠武③、宣武③、河东(太原)②、徐泗(武宁)③、宣歙④、淮南④、魏博①、荆南④、江西④、河阳③、鄂岳④、山南东④、唐随邓(山南东)④、昭义③、河中③、鄆坊②、义成③、剑南④、寿春(州)④、阴山②	忠武节度使李光颜 河阳节度使乌重胤 申光蔡招讨使严绶 鄂岳观察使柳公绰 魏博节度使田布 宣武节度使韩弘 唐随邓节度使李愬 武宁节度使李愿 阴山府兵使朱邪执宜	《全唐文》卷六一七段文昌《平淮西碑》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二四〇元和九年十月——十二年十月 《全唐文》卷五七宪宗《讨吴元济制》 《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 《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咸通元年正月——七月	镇压裘甫起义	浙西④、宣歙④、义成③、淮南④、忠武③、昭义③、武宁(感化)③	浙东观察使王式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咸通元年正月——咸通元年七月 《嘉定赤诚记》卷四〇《辨误门·桐柏观元稹阴碑》
咸通九年十月——十年九月	镇压庞勋起义	武宁(感化)③、忠武③、魏博①、河东(太原)②、兖海③、义成③、淮南④、鄆坊②、义武③、浙西④、荆南④、泗州③、濠州③、禁兵(神策军)	义成节度使康承训 武宁节度使王晏权 魏博节度使何弘敬 淮南节度使令狐绹 荆南节度使崔铉 太原行营招讨使沙陀三部落等军使朱邪赤心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 《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附子绹传》 《新五代史》卷四《唐本纪四》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二五一咸通九年十月——十年九月
乾符二年四月——四年正月	镇压王郢起义	宣歙④、忠武③、宣武③、感化(武宁)③、福建④、南海(岭南东道)④、浙东④	江南诸道招讨使宋皓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二五三乾符二年四月——四年正月 《全唐文》卷八七《讨王郢诏》

客军出兵的时间	客军出兵的目的	客军的来源	客军的统领者	资料出处
乾符二年五月——中和四年六月	镇压王仙芝、黄巢起义	忠武③、宣武③、神策军、感化(武宁、徐州)③、昭义③、淄青③、兖郛③、宣歙④、平卢③、山南东(襄阳)④、荆南④、天平③、义武③、江西④、淮南④、易定③、浙西(镇海)④、义成④、天德②、雁门②	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 平卢节度使宋威 荆南节度使都统王铎 忠武节度使崔安潜 招讨副使曾元裕 江西招讨使曹全晟 襄阳节度使刘巨容 淮南节度使都统高骈 雁门节度使李克用	《全唐文》卷八七僖宗《论河南方镇诏》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 《旧唐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下·黄巢传》 《旧唐书》卷一八二《王重荣传》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二五五乾符二年十一月——中和四年六月 《唐会要》卷七八《都统》

说明:1. 唐代藩镇的类型,依据张国刚先生的《唐代藩镇研究》,将其划分为:河朔型①、边疆型②、中原型③、南方型④四类(序号为该藩镇类型的代号)

2. 基于参与南方平乱战争的“客军”数目众多,尤其那些规模宏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动乱,不便将其一一列出,故只选取在平乱战争中具有代表性的“客军”,在不影响分析结果的前提下,以求以一斑而窥全豹之效。

3. 本表对于具体藩镇的划分,主要依据其所处的地域位置以及对中央的政治取向进行综合考量。

考察上表,我们不难发现参与平定南方动乱“客军”的来源极其广泛,其中既有来自于中原型藩镇的军队,也有来自于河朔型、边疆型以及南方型藩镇的军队,当然也有中央的神策军。就上述各类“客军”参与平乱的频率而言,显然中原藩镇参与最为频繁,为36次;南方财源型藩镇次之,为34次;边疆御边型藩镇又次之,为4次,而河朔割据型藩镇最少,仅为2次,中央神策军为2次。在表中的10次平乱战争中,除了宪宗元和元年平西川刘辟之乱,中央没有征调中原军队参战外,其余各次平定南方动乱的战争,中原藩镇的“客军”从未缺席。中原藩镇的“客军”以如此高密度的出兵,至少可以说明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期间,中原藩镇的“客军”无疑是南方地区平乱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具体而言,中原藩镇中的忠武军参与5次,感化(武宁或徐州)、宣武、义成各4次,昭义、义武各2次,其余诸镇出兵的次数则更少,这足以说明中原藩镇中的忠武、感化、宣武、义成诸镇在平定南方地区的叛乱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忠武军出兵的次数最多绝非偶然,除了诸节帅“心系”皇室,也与其处于“天下精兵处”^①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劲悍”善战不无关系,故忠武军“常为诸军锋”^②。

至于出兵次数仅次于中原藩镇的南方型藩镇,除了没有参与镇压袁晁起义(也许是所起作用微不足道而为史家所忽视),全部参与了其余平定本地区动乱的战争,是出兵频度仅次于中原藩镇的军事力量,当然也是“客军”的重要来源之一。而在南方

藩镇中,淮南镇参与了平定10次动乱中的6次,宣歙镇5次,浙东、江西、荆南镇各3次,浙西、鄂岳各两次,其余则更少,由此可知南方藩镇的“客军”尤以淮南镇、宣歙镇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

边疆与河朔型藩镇,也偶有充任“客军”参与平定南方动乱之举,它们和频繁参与平乱战争的中原藩镇、南方藩镇相比,其作用微不足道。边疆型藩镇合计只参与了其中4次的军事行动,而位于“国之北门”的太原(河东)、雁门、阴山就有3次(均为沙陀部族),1次为京西北的鄆坊镇。常因“两河阻兵”而“咫尺胡越”^⑮的河朔藩镇,它们通常对中央表现桀骜,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参与南方的平乱战争,出兵的次数比边疆藩镇还少,仅为2次,而且均由魏博镇充任。至少在出兵南方平乱的频度上,边疆型与河朔型藩镇远不能与中原藩镇、南方藩镇相提并论。

二、关于出兵南方地区“客军”人数的考察

通过上文的探讨,我们了解全国各类藩镇,甚至中央神策军都参与了南方的平乱战争,那么,是否表明朝廷很“随意”地征调各地“客军”出征,而无需加以区别?他们参与的人数上有无不同呢?这无疑下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唐人对“客军”问题的关注,早在元和、会昌之际就已经开始了,韩愈、杜牧在他们的文集中多次论及这一问题,甚至比较详细地提到各地“客军”出兵南方的人数。元和十年(775年),时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的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中指出各镇出兵淮西“或三二千人”^⑯,而会昌三年(843年),杜牧在《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中也提及此役中“上不过五千人,下不至千人”^⑰。那么,事实情况是否确如韩、杜所言,对此我们需要详加考证。

为了弄清楚诸道“客军”出兵人数的真相,我们必须从有明确记载的史料出发,通过对历次参与南方平叛战争中“客军”的考察,以确定诸路“客军”的数量。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表十次平乱战争中,除平定李錡之乱以及镇压袁晁、王郢起义,诸道“客军”出兵之数诸史不载,我们难究其详,故不将它们列入下文分析的范畴。

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永王璘拥兵乱江淮,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使判官裴茂将兵三千军于瓜步”^⑱迎战永王璘。

上元元年(760年)十一月,宋州刺史淮西节度副使刘展领兵南下叛乱,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将万人屯徐城”迎战^⑲。江淮都统浙东节度使李峘,因畏惧刘展的兵锋,将全部兵权授予楚州刺史李藏用,李收拾散卒才“得七百人,东至苏州募壮士,得二千人,立栅以拒刘展”^⑳。同时,肃宗还命平卢兵马使田神功率“所部精兵五千”^㉑南下平乱。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西川刘辟擅自以“甲卒三万”发动吞并东川的叛乱战争,宪宗敕令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领马步五千人左为左军,左右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领马步二千人右为右军”^㉒火速进剿;同时,令山南西、剑南东川两道协助,而岭南节

度使徐申“表请发卒五千循马援故道”^②入川助战。

元和九年(815年)十月,因淮西吴元济之叛,(宪宗)将“鄂岳卒五千”划归安州刺史李听指挥,而鄂岳观察使柳公绰则“选兵六千属焉”^③。魏博节帅田弘正令其子田布“将兵三千助严绶讨吴元济”^④,宣武节帅韩弘也以子韩公武“领精卒一万二千”集结于洹曲^⑤,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则令所部行营兵马使王沛“率兵五千”^⑥与蔡兵大战于澗河。唐随邓节度使李愬在淮西大部精锐被牵制之机,发动奇袭,“以李祐率突将三千为先锋,李忠义副之,愬自帅中军三千,田进诚以后军三千殿而行”^⑦。

咸通元年(860年)正月,裘甫乱浙东,由于观察使郑祗德率本道“土军”与战屡败,不得已乃求救于邻道,“浙西遣牙将凌茂贞将四百人、宣歙遣牙将白琮将三百人赴之”^⑧。由于南方“客军”战绩不佳,懿宗遂令义成节度使王式为浙东观察使,领“武宁军健卒二千人”^⑨赴任。为了加强其部军力,又诏发诸道兵以次相随,而王则要求“更发忠武、义成军及昭义军”^⑩。王到任,即命“忠武将张茵将三百人、义成将高罗锐将三百人、昭义将跌戮将四百人”分路进击^⑪。

咸通九年(868年)十月,庞勋率北归戍卒起义,占据徐州后,又急攻泗州,淮帅令狐绶命“李湘将兵五千人援之”^⑫。次年正月,朝廷以武宁军节帅王晏权、将军朱克诚、荆南节帅徐商、右神策大将军康承训、太原行营招讨使沙陀三部落等使将军朱邪赤心等,凡十八将“分董诸道之兵七万三千一十五人”^⑬进讨。而“魏博何弘敬奏当道点检兵马一万三千赴行营”进击庞勋^⑭,又诏义成康承训为行营招讨使,朱邪赤心以“突骑三千从”^⑮之。

乾符二年(875年)五月,在中原的濮、曹两州爆发了规模最为空前的农民起义。王仙芝兵锋直指河南诸州,忠武节帅崔安潜“使大将张自勉将兵七千”驰援^⑯。乾符四年三月,青州节帅宋威主动上表“请步骑五千,特为一使,兼率本道兵士,所在讨贼”。僖宗于是授给他诸道招讨草贼使之职,“仍给禁兵三千”^⑰。同年,王仙芝率众进逼江陵,节度使杨知温求救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李“自率州兵及沙陀五百骑赴援”^⑱。乾符六年冬,高骈至淮南招募军旅,得“土客之军七万”,传檄天下^⑲。次年二月,黄巢义军自衡州、永州北上,时都统荆南节度使王铎令前锋都将李系驻守潭州,“有众五万,并诸团结军号十万”。当黄巢顺江而下,潭州一日而陷,“李系仅以身免,兵士五万皆为贼所杀”^⑳。八月,黄巢渡江北上,“时昭义、武宁、义武等军兵马数万赴淮南”^㉑,由于高骈欲图专功之谋,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且草率解散各路援军,使得黄巢军轻松渡淮。九月,朝廷决定仓促在澗水组织防线,于是“徐兵三千道许”^㉒以阻扼义军北上河洛。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得知平定永王璘之乱,隶属于南方藩镇的淮南道所属的广陵郡出兵三千人。平刘展之乱,属于南方藩镇的淮南道出兵万人、浙东道两千人,属于中原藩镇的平卢军出兵五千人。平刘辟之乱,中央神策军出兵七千人,属于南方藩镇的岭南西道出兵五千人。平吴元济之乱,属于中原藩镇的宣武镇出兵一万二千人、忠武

五千人,属于南方藩镇的唐随邓(原山南东道析置之一部)出兵九千人、属于河朔藩镇的魏博三千人。镇压裘甫起义,属于南方藩镇的浙西出兵四百人、宣歙三百人,属于中原藩镇的武宁军出兵两千人、忠武三百人、义成三百人、昭义四百人。在镇压庞勋起义中,属于南方藩镇的淮南出兵五千人,属于边疆藩镇的河东三千人,武宁、徐泗、荆南、义成、河东、兖海、淮南等十八将共七万三千多人(平均每镇四千五百人)。而镇压王仙芝、黄巢起义,属于中原藩镇的忠武军则出兵七千、青州(即平卢镇,原淄青平卢军之一部)五千、武宁三千、昭义武宁义武数万,中央神策军三千、属于南方藩镇的荆南五万。

从以上胪列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韩愈认为诸道发兵“或三二千人”,杜牧所说的“上不过五千人,下不至千人”,其言不确。仅以元和平蔡之役而言,各镇派出“客军”征战南方的人数,最多宣武镇出兵一万二千人,最少魏博镇出兵三千人。如果将考察的视野扩大到以上有明确记载的“客军”几次出兵,不难看出韩、杜所言更是与事实严重不符。事实上,诸道发兵的数量与动乱持续的时间、动乱具有的规模密切相关。譬如,平永王璘之乱、镇压裘甫起义,动乱的规模相对不大,持续时间仅为数月,故诸道“客军”出兵的人数也就相对较少;而平定刘展之乱、吴元济之乱、刘辟之乱,镇压庞勋起义、王仙芝黄巢起义规模宏大,持续的时间至少数月乃至十年,出兵的数量显然要大得多。实际上,每次“客军”参与平乱的人数并不固定,不可一概而论,平定南方动乱的历次战争中,每镇最多发“客军”五万人以上,最少不足千人(三百人),其中发兵二千至五千人的次数最多,为十次,六千至九千人的四次,三四百人的四次,一万人以上的三次,无法估计人数的一次。总体上,诸道出兵人数较多的是南方藩镇,中原藩镇次之,边疆与河朔藩镇又次之,尽管中央神策军仅出兵二次,但人数并不少。根据上述材料,如果仅从出兵南方平乱“客军”的人数而论,稳定唐中期南方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是南方藩镇与中原藩镇的军队。

三、关于出兵南方地区“客军”战力的考察

唐代中期以来,南方地区发生多起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每次朝廷均无一例外引入“客军”的参与。事实上,无论从出兵的频度,还是从出兵的人数,发生动乱藩镇的邻道,其“客军”介入的程度均堪称为最。那么,区域外的“客军”是否还有参与之必要么?该如何解释这一令人困惑问题呢?需要强调的是,诸路“客军”出兵次数频繁、出兵人数众多,虽利于尽快结束战争,但并不能因此简单地将两者画上等号,笔者认为战争的效果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至德元年,领有四道帅印的永王璘“弃分符之任,专用钺之威”^④,擅自引兵东下,公然与在灵武即位的肃宗皇帝分庭抗礼。朝廷遂令淮南节度使高适、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领兵拒战^⑤,但是高、韦二人在此役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至于广陵郡长史李成式、吴郡太守李希言,他们虽积极迎战,但李希言部将元景曜、李成式部将李承庆

兵败投降,丹徒郡太守阎敬之也战败“死之”⁴⁴。最终,在河北招讨判官李铢(中原藩镇)的强力支持下方才完成平叛使命。

上元之际,“阴怀异志”的宋州刺史淮西节度副使刘展“构衅称乱”⁴⁵。强悍善战的刘展部“所向无不摧靡”⁴⁶,致使南方“五道节制,望风溃散,自淮而南,至于海隅,遂无敢保一城、守一节者”⁴⁷。于是,肃宗密令前江淮都统李峘、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率部应战。但是,邓景山所部“逆击不胜”奔于寿州⁴⁸,淮南都统浙东节度使李峘也“败绩奔江西,淮南遂陷于展”⁴⁹,楚州刺史李藏用也屡为刘展所败,受命迎敌的昇州军队同样“不克而遁”⁵⁰。刘展遣将进攻宣州,“宣歙节度使郑灵之弃城走”⁵¹、兵马使姜昌群甚至遣将“诣展降”⁵²。在平卢军到来之前“三分全吴,贼有其二”⁵³。但是,当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受命“统卢龙劲卒”南下后,“展闻之,始有惧色,自广陵将兵八千拒之,选精兵二千渡淮,击神功于都梁山,展败,走至天长;以五百骑据桥拒战,又败,展独与一骑亡渡江”⁵⁴。不久,刘展被田神功擒斩。从平定刘展之乱中,不难看出南方藩镇的“客军”表现非常糟糕,无论淮南的邓景山、浙东的李峘、宣歙的郑灵之还是隶属于淮南的楚州、浙东的昇州等诸路“客军”几乎每战皆北,只有平卢劲卒表现不俗,平刘展之乱基本上是中原平卢军的功绩。

宝应元年,南方地区虽“饥疫相仍”⁵⁵,但唐政府仍敛赋不息。浙东饥民在“豪民”袁晁的率领下举起义旗,不久“积众二十万,尽有浙江之地”⁵⁶。时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命所部南下,于广德元年(763年)四月,生擒袁晁,浙东州县悉被荡平⁵⁷。此役除山南东道节度使嗣曹王李皋率部“弼方伯而宣力”外⁵⁸,诸史不载其他“客军”的参与,故镇压袁晁起义主要是由中原藩镇军李光弼部完成⁵⁹。对于镇压了袁晁起义的军事将领,诸史所记颇有歧义,这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其一,认为平定袁晁起义是袁傜所为,史称“御史中丞袁傜东讨,生擒袁晁”⁶⁰;“袁傜之破袁晁,擒其伪公卿数十人”⁶¹。其二,认为平定袁晁起义是张伯仪所为,史称“浙贼袁晁反,使伯仪讨平之”⁶²;“李光弼奏擒袁晁,光弼使部将张伯仪将兵讨平之”⁶³。其三,认为平定袁晁起义是李光弼所为,“袁晁乱浙东,光弼讨平之”⁶⁴;“台州人袁晁反,诏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讨之”⁶⁵。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种观点尽管存在分歧,但有一个客观事实不容抹杀,即袁傜为李光弼从事、张伯仪为李光弼部将,也就是说袁傜、张伯仪均为李光弼的部下确凿无疑,至于以上三种观点具体孰是,目前在缺乏更为确凿新史料佐证的情况下,比较稳妥也是最可能为众家接受的观点就是李光弼部。

永贞元年八月,西川度支副使刘辟自请节钺,且“求兼领三川”,被拒仍兵发东川⁶⁶。中央令剑南东西川节度使袁滋领兵进讨,但袁“畏不得全,久不进”⁶⁷。朝廷重议出兵之策,“时宿将专征者甚众,人人自谓当选”⁶⁸,在众议难平的情况下,宰相杜黄裳独排众议,令在长武城练兵的神策军将领高崇文充左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军出征。同时,令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犄角应接”;岭南节度使徐申也表请入川助讨⁶⁹。不久,李康兵败被俘,而高崇文则屡立战功,次年九月,高

崇文部克服成都,擒获刘辟。此役中,剑南东西川、山南西、岭南道的“客军”表现并不抢眼,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央神策军,这是唯一一次不是由中原藩镇“客军”完成平乱任务的军事行动。

元和二年,由于宪宗的“平夏定蜀”,使“藩镇惕息”^⑩。长期跋扈地方的镇海节帅李錡极为不安,主动要求入朝,当获准请求后,又“上表称疾”、“迁延不入”,竟然杀死中央任命的留后王澹,进行公开的叛乱。朝廷遂令淮南节度使王锬“率汴、徐、鄂、淮南、宣歙之师,取宣州路进讨”^⑪,在诸路“客军”强大的压力下,大将张子良、李奉仙等反戈擒缚李錡。尽管这次平乱的统帅隶属于南方藩镇的淮南,但参与的“客军”却多是中原藩镇的军队,由于史料记载没有涉及具体的“客军”在战争中的表现,故暂且存疑。

元和九年六月,“擅领军事”的淮西吴元济,公然“阻兵拒命”^⑫。中央于是命宣武、忠武、太原(河东)、武宁、淮南、宣歙诸镇“同为进讨”^⑬。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虽领军万余,然“闭壁而已,经年无尺寸功”^⑭。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则屡战屡败,命袁滋为帅,袁却“懦弱不能军”^⑮。而河阳节帅乌重胤的部将曹华,“前后数十战,大破贼于青陵城”^⑯。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以本军独当一面,连破蔡寇”^⑰，“时光颜战数胜,元济悉锐卒屯洄曲以抗光颜”^⑱,李愬于是“乘其无备”,率军“夜入悬瓠城”,擒获吴元济^⑲。参与该次平乱行动的军队众多,南方藩镇中的山南东、唐邓等镇的军队没有建功,而作为中原藩镇的忠武军、河阳镇则屡立战功,最后完成平蔡使命的表面上为南方藩镇唐邓的“客军”。需要指出的是,李愬建立不世殊勋与中原忠武军将蔡州精锐之师牢牢地牵制在洄曲关系极大,也就是说斯役中建功真正的“幕后英雄”实乃中原“客军”所为。无怪乎《旧唐书》盛赞平蔡之役“忠武一军,破贼第一”^⑳;而向来以严谨著称的司马温公也承认此役“李光颜在诸将中战最力”^㉑这一点。

咸通元年正月,浙东裘甫率众起义,“人不习战、甲兵朽钝”^㉒的南方“土军”屡战屡败,引起全国震动。懿宗责令义成节度使王式领“武宁军健卒二千人”赴浙^㉓。为了加强该部的军力,中央令忠武、义成与淮南诸军随行,但王式认为淮南镇不堪大用,要求“更发忠武、义成军及昭义军”^㉔南下。王式分派忠武、义成、昭义分路进讨,不久平定浙东,裘甫被械送京师。在这次镇压裘甫起义的过程中,先是(本道)浙东观察使郑祗德遣“讨击副使刘勅、副将范居植将兵三百,合台州军共讨之”^㉕,而“范居植死,刘勅仅以身免”,于是郑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新任浙帅薛戎“奏将新卒五百击裘甫”,然“官军大败,三将皆死,官军几尽”^㉖。不得已“求救于邻道,浙西遣牙将凌茂贞将四百人、宣歙遣牙将白琮将三百人赴之”^㉗。这些受命增援的南方“客军”,作战时“诸将或称疾,或佯坠马,其肯行者必先邀职级,竟不果还”^㉘,一副怯弱惧战的丑态跃然纸上。在浙西、宣歙“客军”作战无果的情况下,朝廷才改派中原的忠武、义成、昭义诸军南下,最后擒获裘甫,故此役主要建功者仍是中原的“客军”。

咸通九年十月,在邕管防冬、不堪远戍之苦的徐卒武装北返,时和州刺史崔雍“不